

左尔格小组与宋庆龄 1930 年代初政治活动关系之初探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朱玖琳

《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版，第 237-258 页。

内容提要：

1931 年 6 月，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在上海被捕，牛兰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人员，共产国际利用其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在国际上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是反帝大同盟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名誉主席，自 1931 年 8 月回国之后，她陆续接到百余名德国教授、文学家、艺术家发来的电报，要求她营救牛兰夫妇。同时，负责在中国国内营救牛兰夫妇的左尔格通过史沫特莱联系上宋庆龄。宋庆龄与左尔格小组合作，圆满地完成了营救任务。其时，宋庆龄并非共产党员，她是在反帝大同盟的旗帜下，为她心目中的正义事业而工作。

关键词：左尔格小组；宋庆龄；共产国际

左尔格于 1930 年 1 月奉命来华，1932 年底告别上海返回苏联。他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成员组成成分复杂，并且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所知甚少，有的根本就互不来往。^①他们甚至并不知道自己在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工作，还以为一直在为共产国际服务。

关于左尔格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散见在当年的左尔格中国小组成员的回忆录中，他们就自己的领域，对小组活动的回忆或略或详，或浅或深。必较集中的有情报员方文的《左尔格在中国》和德籍联络员 Hamburger 夫人（笔名鲁特·维尔纳）的《谍海忆旧》，零散的还有情报员陈翰笙的《四个时代的我》、《地下工作二十年》和联络员张文秋的《毛泽东亲家张文秋回忆录》等。美国 F·W 狄金、G·R 斯多利合著的《佐尔格案件》运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对左尔格在中国的活动所涉不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披露了部分左尔格在上海情报活动的未知史实，也印证了当事人的一些回忆。

宋庆龄于 1931 年 7 月 31 日由德国柏林启程归国，回国后即忙于营救邓演达、牛兰夫妇，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御侮自救会，筹办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这种种活动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何关系，近年来已不断有文披露^②，但左尔格及其情报小组在其中有何作用还未见有专文论述。笔者试以公开出版物为基础，并结合宋庆龄研究成果，对此未知领域做一初步探索。

^① 这一特点是情报组织的常态，左尔格小组亦如此。比如，情报员方文称：“史沫特莱还介绍当时中国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陈翰笙和他的爱人顾淑型与左尔格相识。这两位同志曾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给史沫特莱和左尔格许多帮助。但由于陈的国民党科学院的身份，不便被吸收为正式情报骨干，但他们利用他们的官员身份作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工作。”（方文著：《左尔格在中国》，北京时事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3 页）方文认为陈翰笙只是从事了外围工作，并非正式情报骨干，因而以为自己的重要性远在陈翰笙之上，左尔格供词中的“王”指的就是他本人。百岁老人陈翰笙带着一身的秘密离开了人世，他生前的回忆录涉及到情报工作部分的，不是闪烁其词就是蜻蜓点水。倒是当年的联络员 Hamburger 夫人和张文秋均指出，左尔格在上海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是陈翰笙，他是左尔格小组的二号人物。张文秋还根据陈翰笙当时的化名“王如秋”指出，左尔格供词中的“王”是陈翰笙。（见江枫：《陈翰笙与史沫特莱和佐尔格》注释②，刊于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 年版，第 215 页。）

^② 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 年第 4 期；邵雍：《宋庆龄与苏联关系新探（1927—1929）》，《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 5 月第 34 卷第 3 期；朱玖琳：《论宋庆龄抗战思想之演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 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邵雍：《伊罗生、〈中国论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 年度）哲学·历史·文学学科卷》；邵雍：《1933 年上海反战大会始末》，《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8 年第 4 期；邵雍：《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述略》，《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第 3 期；陈锦驿：《伊罗生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一、宋庆龄与左尔格小组关系的建立——史沫特莱和反帝大同盟

左尔格之所以能在上海发展情报小组，基本上依靠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帮助，这已是众所周知，本文不再赘述。那么左尔格与宋庆龄建立来往的中介人是谁，从已有史料来判断，亦非史沫特莱莫属。而史沫特莱与宋庆龄建立联系所凭借的机缘，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据说宋庆龄与史沫特莱 1928 年 11 月在莫斯科初次接触。^①但是，1928 年 11 月，宋庆龄身在德国，史沫特莱不可能在莫斯科见到宋庆龄。她俩的第一次会晤应该与反帝大同盟的成立有关，而这一因素也是宋庆龄日后会与左尔格小组合作的主要原因。

反帝大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宋庆龄称之为 Anti Imperialist League），其前身为共产国际宣传家、青年共产国际创始者、德国共产党员维利·缪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1926 年在柏林成立的反殖民压迫大同盟（League Against Colonial Oppression），原名世界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大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②1927 年 2 月 10 至 15 日，反帝大同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各民族及各国团体代表共计有 174 人，“当时讨论之议题，注重政治方面，议决各民族互相联络，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之种种计划”。随后于 12 月 10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总评议会，“专门讨论其内部组织问题，结果新设民族部、国际部等，使内部组织更加完备”^③。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反帝大同盟的成立宗旨“在于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统一的支持立场，以对抗国际联盟对殖民主义的维持现状政策，计划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使用印度士兵保护英国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利益之类的帝国主义行动上。”反帝大同盟的创办经费由共产国际提供，“后来共产国际有意识地不对这个组织实行直接控制，以避免它被说成是莫斯科操纵的。”^④反帝大同盟成立初期有很多遭受殖民压迫、反对殖民统治的非共产主义成员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初准备派胡汉民和国民党驻德支部的廖焕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与会，后国民政府指派廖焕星与会。^⑤蒋介石也曾在 1927 年 2 月 13 日从广州致电大会，称：“闻贵会已正式开幕，予谨以满腔热忱致电。”^⑥1928 年，共产国际复直接插手反帝大同盟，实行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遭到许多非共产主义成员的反，结果 1929 年英国独立工党的 James Maxton 被除名，随后绝大多数非共产主义成员亦被开除。^⑦

1927 年，在反帝大同盟第一次大会闭幕式上，宋庆龄与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罗曼·罗兰(Romain Roland)、罗素(Bertrand Russell)、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巴比塞(Henri Barbusse)等被推选为执行理事会成员。^⑧宋庆龄受邀参加 12 月 10 日的总评议会。不久，“四一二”蒋介石上海清共，“七一五”汪精卫武汉分共，宋庆龄愤而出走莫斯科。12 月 1 日，“广州起义”遭镇压，参与起义的苏联驻广州十余名外交人员被杀，蒋介石宣布与苏俄断交。10 日，宋庆龄在莫斯科致电布鲁塞尔反帝大同盟评议会，对因故未能参加会议表示十分遗憾，并强烈呼吁会议支持中国革命。该电全文译文如下：

反帝大同盟

布鲁塞尔

^① [美]简尼丝·麦金农著，江枫、郑德鑫译：《史沫特莱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2 页。

^② 参见英国赫尔大学档案馆（Hull University Archives）“反帝大同盟档案”（Papers of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藏档说明，<http://archiveshub.ac.uk/features/hullhistory-leagueagainstimperialism.html>；<http://www.open.ac.uk/researchprojects/makingbritain/content/league-against-imperialism>（英国开放大学 The Open University 网站）。

^③ 《申报》1929 年 6 月 22 日。

^④ 麦金农著：《史沫特莱传》，第 162—163 页。

^⑤ 《申报》1926 年 4 月 17 日、8 月 1 日。

^⑥ 《申报》1927 年 3 月 6 日。

^⑦ 参见荷兰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反帝大同盟档案（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rchives）藏档说明，<http://www.iisg.nl/archives/en/files/1/ARCH00804.php>。

^⑧ 麦金农著：《史沫特莱传》，第 163—164 页。

万分抱歉因形势所碍不能与会,强烈呼吁大会加强对中国在英日帝国主义的帮助和恫吓下的白色恐怖和军事独裁政权作斗争。中国革命工农的英勇斗争值得全世界受压迫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积极援助,因为中国革命是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堡垒的关键,所以全世界受压迫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投到中国革命上来,视中国的革命斗争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尽一切可能来保卫中国的革命斗争。

大会应该立即采取的第一个最实际的步骤是将世界人民组织起来,呼吁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和炮舰。没有这些军队和炮舰做依靠,反动政府会很容易就被中国人民推翻掉;第二步是要求废除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夺了中国的财政大权,从而使中国还不如殖民地国家;第三步是撕去中国反动政府标榜革命从而误导其他国家人民的假面具,向全世界揭露中国反动政府的血腥暴行和帝国主义走狗的本质。

宋庆龄

1927年12月10日^①

宋庆龄随后于17日致电蒋介石,严斥其与苏俄绝交是“自杀行为”;18日蒋回电,暗示宋庆龄不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23日宋再电蒋,指斥蒋是帝国主义的同谋。23日当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发表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来往信件的建议。”^②

宋庆龄同高尔基、尼赫鲁、罗曼罗兰、巴比塞等非共产国际知名人士是反帝大同盟执行理事会成员,而反帝大同盟的执行书记则由两名共产党员联合担任,一人是维利·缪岑贝格,另一人就是史沫特莱曾经的伴侣、加入德国共产党的印度人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③。此时,史沫特莱已与恰托分手,但她仍然拥护他的观点,并且密切地关注着反帝大同盟。反帝大同盟成立不久,她就开始致力于让中国的消息进入印度的报刊。她利用国民党在柏林新闻处的消息来源,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报道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在中国的活动。^④

1928年,史沫特莱决定前往中国。她于10月27日离开法兰克福前往柏林,从柏林启程经苏联赴中国,途中在莫斯科下车观光一周,11月底登上开往中国的列车。而1928年11月,宋庆龄身在德国,她到12月下旬才秘密赴苏联,准备经苏联回国,参加原定1929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奉安大典,因奉安大典改期,她后来又返回了柏林。宋庆龄抵达莫斯科时,史沫特莱的列车即将或者已经到了中国,她俩不可能在莫斯科会晤。

反帝大同盟的本部设在柏林(1933年纳粹上台后移往伦敦)^⑤,宋庆龄是反帝大同盟的执行理事,又身在柏林,史沫特莱离开柏林之前,势必要去拜访她。史沫特莱传记的作者麦金农很有可能误读了史沫特莱这一时期的来往书信,把史沫特莱赴中国途中与宋庆龄的会晤从柏林误植到莫斯科。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史沫特莱随即拜访了她。左尔格小组的二号人物陈翰笙1929年与史沫特莱相识,正是在宋庆龄的住处。^⑥陈翰笙说时间“大约是1929年2月”。但是,1929年2月宋庆龄还没有回国,她是在1929年5月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的,6月2日到沪,居住3月余,9月21日再度出国。陈翰笙是在1929年6月至9月

^① 笔者译,该电英文原件藏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几乎所有宋庆龄传记及相关文章均因该电而误以1927年12月10日为反帝大同盟的正式成立日,并误以为宋庆龄是创始人之一,其实是将反帝大同盟的总评议会误会为成立大会了。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号记录》(1927年12月2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③ 参见荷兰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反帝大同盟档案”(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rchives)藏档说明, <http://www.iisg.nl/archives/en/files/1/ARCH00804.php>。

^④ 麦金农著:《史沫特莱传》,第171页。

^⑤ 参见英国赫尔大学档案馆(Hull University Archives)“反帝大同盟档案”(Papers of 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藏档说明, <http://archiveshub.ac.uk/features/hullhistory-leagueagainstimperialism.html>

^⑥ 陈翰笙著:《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间在上海宋庆龄处结识史沫特莱的。

在这一段时间中，反帝大同盟于7月20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宋庆龄原允到会演说，但因故未能成行，但同萧伯纳等当选为名誉主席。^①7月10日，“中东路事件”发生。8月1日，宋庆龄在国际反战日致电反帝大同盟柏林本部，抨击南京政府谓：“反动的南京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②这一天，上海反帝大同盟成立，但是这样的组织已被国民政府宣布非法。6月29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召开第32次常会，临时动议的其中一条谓：“查有反帝大同盟者，态度暧昧，分子复杂，显系反动派假借名义，阴谋捣乱之反动团体，应请钧会设法查禁，以遏乱萌案。”^③

鉴于陈翰笙共产国际情报人员的身份，以及史沫特莱与反帝大同盟的特殊关系，他们三个人在这一阶段相遇绝非偶然。麦金农《史沫特莱传》称：“1929年，这两位女性在上海重逢，有一年的时间，史沫特莱在帮助孙夫人处理来往信件和撰写演讲词，特别是有关反帝大同盟的部分。（孙夫人是大同盟执行官员之一，而史沫特莱则和同盟的领导人如尼赫鲁和罗杰·鲍德温等人有私交。）”^④据此，宋庆龄1929年8月1日致反帝大同盟电报有可能是由史沫特莱起草的。

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牛兰的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即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其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组织科负责人，但在当时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被误认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⑤共产国际随即通过反帝大同盟执行书记缪岑贝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在全球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指责中国政府为了铲除工会而迫害牛兰夫妇。^⑥

如此大张旗鼓地营救一名情报人员，笔者认为，这其中原因除了牛兰肩负重要秘密任务之外，也与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的政治意图有关。左尔格告诉方文：“共产国际准备发动一个全世界范围的抗议蒋介石政府法西斯统治运动，抗议它任意侵犯人权。”“牛兰案正好作为发动这次运动的具体根据。”^⑦对此鲁迅认识得很清楚，他认为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从形式上看，是对牛兰夫妇的援救，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支持”^⑧。

左尔格奉命组织营救，他告诉方文：“在国外的的工作由共产国际安排，中国国内工作由史沫特莱联系宋庆龄、鲁迅等进行。”^⑨

以反帝大同盟为号召，以史沫特莱为中介，左尔格小组为营救牛兰夫妇与当时尚非共产党员的宋庆龄建立起合作关系。

二、宋庆龄与左尔格小组的合作——牛兰事件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为奔母丧回国抵达上海，自回国后，宋庆龄就不断陆续收到大量要求她帮助营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的电报，主要是德国百余名教授、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中最重要的是18日德国31位最著名的作家、19日十余位德国最著名的艺术家、20日德国著名版画家珂勒惠支等十余位德国妇女联名打来的德文电报，此外还有身为国际红色救济会主席的德国妇女领袖、共产党员克拉拉·蔡特金的个人来电，以及同

^① 《申报》1929年7月22日、1933年2月18日。

^② [美]兰德尔·古尔德著，王丽娜译：《孙逸仙夫人忠于信仰》，《文献》1981年第10期。

^③ 《申报》1929年6月30日。

^④ 麦金农著：《史沫特莱传》，第210页。

^⑤ 详见杨奎松：《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⑥ [美]魏斐德著，章红等译：《上海警察 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

^⑦ 方文著：《左尔格在上海》，第75页。

^⑧ 方文著：《左尔格在上海》，第89页。

^⑨ 方文著：《左尔格在上海》，第87页。

为反帝大同盟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等的个人来电。^①

在左尔格的布置下，史沫特莱很快找上刚刚回国的宋庆龄。^②她给宋庆龄写信，大意是为救一个人的生命，要求宋庆龄在百忙中给予5分钟谈话。宋庆龄看过后把信拿在手上对陪伴她回国的胡兰畦扬了扬说：“这封信的英文写得很好，这信的英文基础很高深，话没有多少句，语言和用字都很美的。”史沫特莱要宋庆龄救的就是牛兰。宋庆龄立即复信，约在寓所会见史沫特莱。^③不久，宋庆龄会见史沫特莱。8月24日，史沫特莱在《字林西报》上发表了经宋庆龄修改的采访稿，^④向外界公布宋庆龄的政治态度：不参与宁粤调停，不是第三党成员，政治见解仍然和1927年在武汉所陈述的相同（即《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⑤

宋庆龄此时要营救的还有她的亲密战友邓演达。^⑥在宋庆龄回到上海的第五天，8月17日，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在上海因叛徒告密被捕，旋即押解南京，宋庆龄随即投入营救。9月，她给杨杏佛写信说：“由于我对邓和牛兰夫妇案的关注，已收到许多卑鄙的信件（可是这些信并不能阻止我为争取释放他们而努力）。”^⑦

12月14日，宋庆龄在南京面见蒋介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人员莱谢1932年1月14日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工作报告中汇报到：

宋夫人从南京回来了，她去探视了监狱里的牛兰夫妇，并向他们转交了防寒物品。此外，她还到了蒋介石那里，与他商谈释放牛兰夫妇的事，因为蒋曾答应过她在他可能引退时要做这件事。当然，他现在拒绝这样做，他对她说，他要把这两个人移交民事法庭，他没有别的办法。就在这一天，他下令枪毙邓演达，而广州人曾要求释放他。晚上，宋[庆龄]夫人与佐尔格进行了一次谈话，并要求派100名优秀共产党员去南京，在那里她想为他们弄来一些武器，并用政府汽车把牛兰[夫妇]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计划可能是不错的，但我无法判断，她本人有多大勇气和毅力来实现这个计划，因为我不认识宋夫人，也不知道，她对南京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自然，这件事不可能很快组织实施，因为我怎么也未与共产党联系上。……第二天^⑧，蒋介石解除了自己的职权。依我看，宋[庆龄]夫人的计划是在对邓演达被枪杀事件极其气愤和愤怒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她与邓演达关系十分密切，但没有认真地实施这个计划。宋[庆龄]夫人发表了一份声明^⑨就病倒了。格尔曼离开后，夫人与费舍尔建立了联系。佐尔格带一包邮件去了哈尔滨，而夫人因病未能接见费舍尔。后来，夫人和费舍尔之间对牛兰[夫妇]案件的下一步行动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她给他写了两封信，但他没有回信。费舍尔给纳乌曼医生打电话，想跟人聊一聊，这以后我就到费舍尔那里去了。夫人已跟南京民事法庭的最高法官谈妥，让费舍尔去南京找他，但费舍尔要等将牛兰[夫妇]移交民事法庭的

^① 《文艺新闻》1931年9月7日，转引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3—44页。

^② 方文回忆1932年初左尔格向他布置营救牛兰夫妇的工作（见方文著：《左尔格在上海》，第74页），但是按照史沫特莱见宋庆龄的时间可知，左尔格在牛兰夫妇被捕后不久就迅速介入营救工作。

^③ 胡兰畦：《难忘的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唐宝林著：《深谷幽兰——战时“国母”风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173页。

^④ 1931年8月21日，宋庆龄致函杨杏佛，要求他转告史沫特莱“勿将外文稿发表”，因她要亲自重写。（《宋庆龄1931年8月21日致杨杏佛函》，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⑤ 《字林西报》1931年8月24日；《与史沫特莱的谈话》，载《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2页。

^⑥ 详见朱玖琳：《大革命失败后的宋庆龄与邓演达》，《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⑦ 《宋庆龄1931年9月致杨杏佛函》，载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27页。

^⑧ 指1931年12月15日。

^⑨ 指宋庆龄1931年12月19日撰写的《宋庆龄之宣言》，宋庆龄在宣言中怒陈：“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3—86页。）

正式证书。此外，他想先再与汪精卫取得联系。^①

宋庆龄此次南京之行没有大张旗鼓，故未见诸报端。之所以选择12月14日见蒋，主要是因为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处得到传闻说邓演达已遇害（邓演达已于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遂赴南京见蒋。宋庆龄对蒋介石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作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默然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悲愤难奈，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了楼。^②

结合莱谢的陈述可以判断，宋庆龄是先去监狱探视了牛兰夫妇，随后去找了蒋。见蒋后，宋庆龄先谈的应该用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的事，随后谈的才是邓事。

但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只记了牛兰事，只字未提邓事。

12月14日晚，蒋介石日记云：“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

12月15日，蒋日记云：“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未知以后如何自反以报答亲恩与党国也。”

12月16日，蒋终于憋不住，在日记中透露了宋来见他告以蒋经国换牛兰事：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③

蒋介石为宋庆龄“以经国交还相诱”而怨恨宋，而宋庆龄则以蒋介石杀害邓演达而痛恨蒋。她当晚即面见左尔格，要求左尔格组织武装营救牛兰夫妇。但正如莱谢的分析，她的计划“是在对邓演达被枪杀事件极其气愤和愤怒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没有认真实施。

气愤至极的宋庆龄病倒了，她在9月刚因肾病复发而赴南洋疗养，未及3月又再次病倒，病势当不轻，可她在病中还在惦记营救牛兰夫妇，联系费舍尔商讨营救计划。

从莱谢报告中的费舍尔能够自由面见南京民事法庭的最高法官来判断，这个费舍尔就是牛兰的西人律师。报纸时称其“费斯”、“费区”，亦是宋庆龄后来组建的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委员。牛兰夫妇开始绝食后，宋庆龄曾偕此人赴南京探监，并劝进食，联系保外就医等等。^④此人参与创办的威贺姆律师事务所经常出庭为苏联的利益辩护。牛兰夫妇被捕后不久，7月3日，此人曾由上海前往苏联，请示共产国际，“在牛兰案中他和他的同事应该采取的方针，安排法律诉讼的费用，寻找证明牛兰瑞士国籍的证据，在欧洲为推动他们的获释组织一场运动。”^⑤费舍尔此行获得成功，“保卫牛兰委员会”随即在欧洲宣布成立。

国际行动由共产国际全盘操纵，国内营救总指挥左尔格定的计划则分两步同时进行：左尔格负责秘密调查工作，史沫特莱负责公开援救工作。^⑥

在他们的安排下，宋庆龄于1932年1月13日，和美国记者伊罗生、史沫特莱等一起，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在上海创办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以之为喉舌，“反对在华的帝国主义，从道义上支持苏维埃中国并开展为释放鲁埃格及其妻子的运动。”1932年8月，共产国际鉴于牛兰夫妇案审理在即，特别加拨资金给《中国论坛》。^⑦

同牛兰夫妇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年仅3岁的儿子吉米。吉米的生计受到各方关注，史沫特莱还因为Hamburger夫人对吉米表现出的冷漠而疏远了她。^⑧经史沫特莱安排，伊罗

^① 《莱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关于在华工作的报告》（1932年1月1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95—97页。

^② 史夫：《浩气冲霄》，载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③ 杨天石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II，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66页。

^④ 《申报》1932年7月12、16日。

^⑤ [美]魏斐德著，章红等译：《上海警察 1927~1937》，第197页。

^⑥ 方文著：《左尔格在上海》，第90页。

^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64(B)号记录》（1932年8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92—193页。

^⑧ 《谍海忆旧》，第84页。

生出面从监狱里把孩子领了出来，并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将孩子安排给一对德国夫妻抚养，并为孩子争取到探监的权力。^①

因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南京政府暂时搁置牛兰案，宋庆龄也将注意力转向开办“国民伤兵医院”支援抗战。战事告一段落后，4月4日，宋庆龄偕杨杏佛、宋子安等同游闵行，她还带上了小吉米，吉米依偎在子安的怀里，和大家一起照了一张合影。^②



随后，南京政府重启牛兰案的审理，宋庆龄于是继续开展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4月26日，杨杏佛起草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联名的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院长居正的电文，要求公开审判，许其自聘律师辩护等。5月3日，蔡元培单独致电汪精卫，大意与联名电同。^③7月11日，宋庆龄从上海到达南京，偕牛兰二位辩护律师及一位亲属前往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告他们停止绝食。^④同日，由宋庆龄任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的上海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发表成立宣言。^⑤7月12日，宋庆龄为营救牛兰夫妇，亲自找汪精卫及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等进行交涉。^⑥7月15日，宋庆龄在上海与蔡元培、杨杏佛拟就保状，保牛兰夫妇外出就医。^⑦7月17日，宋庆龄和杨杏佛再赴南京，为牛兰夫妇一案再次与国民党司法当局交涉，结果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三人具保让牛兰夫妇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牛兰夫妇亦同意停止绝食。^⑧8月25日，宋庆龄、蔡元培在牛兰夫妇无期徒刑后，请求特赦牛兰夫妇。^⑨

牛兰夫妇被援引大赦条例而从死刑改判无期徒刑^⑩，左尔格小组的营救行动可谓成功落幕。但是左尔格小组也因而暴露，左尔格本人就一直处在监视之下。¹¹1932年底，左尔格返回莫斯科，左尔格小组参与营救的大部分成员亦撤离上海。

多年后，宋庆龄在读了战后出版的一本关于左尔格的书后，对友人爱泼斯坦说，她认识

^① 方文著：《左尔格在上海》，第88—89页；罗威：《“牛兰事件”始末》，《中华读书报》1998年2月25日。

^② 一般文章均称吉米是在1934年1月10日牛兰夫妇嘱托伊罗生将6岁的吉米交宋庆龄抚养后，由伊罗生带出监狱。牛兰夫人1934年1月10日从狱中致宋庆龄函称：“十二月二十七日有人带着我们的小孩来看我们，他看见了他的父亲睡在床上已经绝食八天了。他的绝食消息这时才传出去。”据此，吉米早就不在监狱中了。（《中国论坛》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13日，转引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52页。）从此照可知，吉米早就被伊罗生接出监狱交给宋庆龄了。

^③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页；《申报》1932年5月4日。

^④ 《申报》1932年7月12日。

^⑤ 同上。

^⑥ 《申报》1932年7月13日。

^⑦ 《申报》1932年7月16日。

^⑧ 《申报》1932年7月18日。

^⑨ 《申报》1932年8月26日。

^⑩ 《申报》1932年8月20日。

¹¹ [美]F·W·狄金、G·R·斯多利著，聂崇厚译：《佐尔格案件》，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和敬重左尔格，认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并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①

左尔格走了，而宋庆龄则依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继续执着于她心目中的正义事业。她一直关注着狱中的牛兰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吉米。吉米在德国夫妇 1936 年回国后被接到宋庆龄家中住了几个月，直到苏联来人将他接回苏联。而牛兰夫妇则在 1937 年南京陷落之前，狱卒打开牢门放人后溜出监狱，来到上海。宋庆龄把他们安顿在一个空闲的公寓中，还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具。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1939 年最终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也因此而顺利地返回苏联。^②

三、历史的谜团

一）宋庆龄是否为左尔格传递军事情报？

1932 年夏，左尔格得到了一份重要情报——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魏策尔等人制定的对中共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战略计划，左尔格向莫斯科中央总部做了报告。中国红军得到情报后，立即转移到了西北地区，这完全出乎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家们的意料，使他们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③

《佐尔格的一生》作者在书中披露这一史实后，援引了德共党员格哈德·艾斯勒教授的陈述，认为左尔格是通过该教授将情报带给了中共。但该教授陈述中表示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是 1929 年至 1931 年，他代为传递的情报显然是前三次围剿的情报而不是第四次的。

那么第四次的传递人是谁？杨国光在所著《谍海巨星左尔格》一书中称：“左尔格把这情报也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使红军在国民党‘围剿’苏区前作好了准备。”^④

杨先生未注明出处，但是这一说法却得以传播。笔者认为，这一可能性不大，左尔格小组的成员各司其职。一生严守机密的陈翰笙从未说过他是左尔格小组的重要成员，更别提他的任务。陈翰笙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他从 1928 年到 1934 年利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组织农村社会调查，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利用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公开地从理论上支持中共的土地革命。他是在 1936 年在莫斯科时才由王明、康生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的。按照左尔格的规矩，情报员为共产国际（其实是红军总参第四局）工作的时候，要切断与中共的一切关系。^⑤

况且左尔格可以与中共地下党直接联系，这么重要的情报无需冒险辗转送出。左尔格可以直接见周恩来，周恩来 1931 年 12 月离开后，与左尔格联系的极有可能是代替周恩来上海领导中共特科的潘汉年（当时中共方面负责组织牛兰活动的就是潘汉年），但是绝不可能是通过陈翰笙与中共地下党联系，那么所谓左尔格通过陈翰笙、宋庆龄传递情报给中共地下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二）宋庆龄究竟何时加入共产党？

关于宋庆龄入党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 1935 年 5 月与联络部负责人有一份谈话备忘录，特别提到了宋庆龄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关系。报告人说：“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⑥报告人还提到吸收宋庆龄入党的那位共产国际代表在 1933 年底以前已经奉召回国。那么宋庆龄究竟何时入党？是不是在

^①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3 页。

^②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1 页；罗威：《“牛兰事件”始末》，《中华读书报》1998 年 2 月 25 日；张珏：《“老年人”回忆宋庆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红旗飘飘》（27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德]尤利乌斯·马德尔著，钟松青、殷寿征译：《佐尔格的一生》，群众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 页。该书错德共党员格哈德·艾斯勒教授，认为该教授正是

^④ 杨国光著：《谍海巨星左尔格》，学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 页。

^⑤ 张文秋著：《踏遍青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4 页。

^⑥ 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 年第 4 期。

左尔格时代就已入党？有学者认为是在 1933 年 5 月之前，还有学者甚至认为应该在 1929 至 1931 年之间，^①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按照报告人的语境，宋庆龄显然是共产国际代表在离开中国之前介绍入党的，但查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没有一个是 1933 年底以前回国的。

当时被直呼为代表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远东局书记、驻华代表埃韦特。他于 1932 年 3 月被委派来华，1934 年 8 月回莫斯科，他走后，共产国际驻华政治代表曾一度空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黄文杰为此要求共产国际再派代表来上海。^②

埃韦特在华期间，于 1933 年 2 月 7 日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 3 号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宋庆龄：“我们已着手筹备在上海召开反帝代表大会。在北平也将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将尽量尝试半合法地举行这次会议（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让缪岑贝格组织的合法组织者来进行由缪岑贝格、巴比塞、宋庆龄等人筹备的上海反帝大会。我们在电报中已提出了这个要求）。"^③他所说的反帝代表大会是指 1933 年 9 月 30 日在上海举行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简称远东反战会议）。1932 年 8 月，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又称“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以反帝大同盟为基础而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即成立于该大会上，因忙于牛兰案未与会的宋庆龄当选为反战委员会代表^④。自从共产国际着手筹备远东反战会议后，埃韦特便经常与宋庆龄接触。埃韦特在 1933 年 7 月 28 日的第 6 号报告中说：“大会的前景很渺茫，因为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被杀和威胁要处罚其他积极分子之后，所有动摇的自由派分子都表现得惊慌失措，大部分人拒绝参加任何工作而一部分人退出了组织。宋庆龄表现得很好，仍与我们合作。”^⑤在组织中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时，1934 年初，王明和康生曾表示必须把宋庆龄排除在外，因为她好像太“红”了，不利于在形式上建立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目标，应该尽量吸引宋子文这样的人参加，但是遭到了埃韦特及其搭档赖安的拒绝。^⑥

1933 年至 1934 年间，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华诸代表之间内部矛盾激烈，埃韦特与搭档赖安和弗雷德之间均存在矛盾。弗雷德于 1934 年 3 月被召回国，而埃韦特则在赖安于 1934 年 7 月 3 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发出带有控告内容的信之后不久，被召回国。1934 年 10 月，盛忠亮被捕后，赖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赤色工会驻华代表贝克相继奉召回国。这些代表们回国后均就其在华工作情况做了报告，从他们在华时及回莫斯科后的报告中，关于宋庆龄部分可以理出这样一条头绪：埃韦特和赖安负责反帝大同盟工作，他们俩为了营救牛兰夫妇、筹备远东反战会议、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等工作与宋庆龄接触频繁，尤其埃韦特，还经常在自己的寓所招待宋庆龄和史沫特莱^⑦。1933 年 11 月 7 日和 1934 年元旦，宋庆龄在寓所举行庆祝会，除了国际联络部的代表之外，埃韦特夫妇、赖安、弗雷德及红军总参第四局的 2 人均莅临参加。赖安也在弗雷德的寓所见到过宋庆龄。在意识到与宋庆龄的频频接触对秘密工作不利时，他们才于 1934 年 3 月以后停止同她的密切联系（不是完全断绝来往）。^⑧

^① 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 年第 4 期；程新国著：《晚年蔡元培》，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8 页。

^②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王明和康生的信》（1934 年 12 月 29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 14 卷，第 338 页。

^③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 3 号报告》（1933 年 2 月 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 14 卷，第 308 页。

^④ 《申报》1932 年 4 月 28 日、8 月 29 日。

^⑤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 6 号报告》（1933 年 7 月 2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 13 卷，第 466 页。

^⑥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 1 号报告》（1934 年 1 月 2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 14 卷，第 36 页。

^⑦ 关于史沫特莱的身份非本文重点，在此不做详述。笔者认为，史沫特莱初在上海由左尔格介绍给共产国际时尚非共产党员。1933 年 5 月中旬，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要求帮助史沫特莱赴苏联疗养。1934 年 9 月史沫特莱再次来华时，是因埃韦特推荐，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华接管伊罗生的《中国论坛》，此时她已是“同志”。但其率性而为的工作作风导致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1935 年 5 月 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议召回史沫特莱，有人还建议要追究史沫特莱推荐者埃韦特的责任。

^⑧ 详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赖安的谈话记录》（1934 年 11 月 2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 14 卷，第 296、297 页；《赖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关于上海形势的谈话速记记录》（1934 年 12 月 2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 14

从共产国际诸代表的地位以及他们与宋庆龄之间往来的密切度来判断,介绍宋庆龄入党的非埃韦特莫属。埃韦特是于1934年8月回国的,而那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派往远东的代表与他的负责人谈话备忘录所说共产国际驻华政治代表1933年底回国其实是误记。此人应该是格伯特,他于1932年春天来到中国,恢复因牛兰被捕而与中共中央、苏区和朝鲜中断的联系,1934年10月盛忠亮被捕后撤回莫斯科。他在1936年9月29日就上海工作所做的报告里,对埃韦特何时回国表述亦含混不清,而且明显不清楚埃韦特被召回的真实原因。^①

那么埃韦特是何时介绍宋庆龄入党的呢?笔者认为不能以1933年5月她代表共产国际去探视廖承志来说明她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一直在借助她的特殊身份,利用她为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4月,她在杨杏佛的陪同下,为共产国际去试探黄平是否已叛变,她对押送黄平来的人表示她并不是共产党员,押送者则对宋庆龄冷嘲热讽地说:“因为您是国母,我们将为您做一切。我们甚至可以将所有背叛自己党的共产党员都带到您这里来,而他们很多,可给您带来与他们见面的快乐……”^②此语惹恼了宋庆龄,但此人的发泄正说明了共产国际找宋庆龄来执行这种任务的意图。反帝大同盟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国际名流,道理也与这个押送者说的差不多。他们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同情苏联,支持反帝事业,他们出面的效果远胜于共产党员。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他们加入共产党或者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

宋庆龄一直支持共产国际的反帝事业,但起初并不完全支持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在牛兰夫妇事告一段落后,宋庆龄曾准备赴欧,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在华人员表示要在赴欧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庆祝十月革命15周年。^③但她最终未成行,1932年12月,她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法律手段公开救援被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第一次打破了完全消极和听天由命时面对逮捕、拷打和枪杀的可恶制度”^④。次年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主席,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但是,这一组织主要是中共地下党在操纵,行为过激,连共产国际都认为“在组织方面,这件事不应给以过高评价”^⑤。4月23日,宋庆龄与副主席吴迈律师均向该会提出辞职,而吴迈继因强烈反对该会各种过激行为于4月26日被该会除名。^⑥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遇害身亡,埃韦特赞扬宋庆龄在杨杏佛遇害后,大多数人都退缩的情况下,“表现得很好,仍与我们合作”。这种表述上的你我之别只能说明此时的宋庆龄还不是“同志”。

从格伯特1935年5月的这份谈话备忘录语境来看,备忘录特别强调:“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笔者判断宋庆龄应该是在远东反战会议成功召开之后被吸收入党的。这也许与她的助手杨杏佛在筹备远东反战会议的关键时候遇害有关。邓演达遇害时,她愤然宣布国民党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杨杏佛遇害则自然会她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成为她加入共产党的催化剂。1934年王明和康生在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时要排除宋庆龄,无非是害怕她的红色身份万一暴露,会对该活动不利。

所以,笔者认为宋庆龄应该是在1933年9月,远东反战会议成功召开之后加入了共产党。

卷,第322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格伯特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1936年9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60页。

^①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格伯特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1936年9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60页。

^② 《艾萨克斯关于宋庆龄同黄平1933年4月6日谈话情况的报告》(1933年4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379页。宋庆龄曾于3月受托去南京见黄平,但未成功。见《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3年3月1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350页。

^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149页。

^④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398页。

^⑤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1933年3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344页。

^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国民御侮自救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情报选》,《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2期。

历时的谜团还有很多，比如左尔格小组与第三党有何联系？在陈翰笙闪烁其词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那个时候经常为营救牛兰夫妇，为民权保障同盟给报社送材料，为宋庆龄与律师之间传递信件，而同时送信、送材料的还有谢树英。^①，谢树英是邓演达的朋友，第三党成员，他并非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为什么他会成为送信、送材料的人？

另外，胡兰畦与左尔格小组有什么瓜葛？胡兰畦 1931 年在“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返回德国，是史沫特莱神秘莫测地安排陈翰笙护送她上船的，陈翰笙为此也一头雾水。^②胡兰畦经历丰富，身份复杂，她 1925 年加入国民党，1929 年成为“第三党”江西省委委员和南昌市委组织部长，1930 年 10 月在德国加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陈翰笙多年后还在向宋庆龄打探胡兰畦的身份，同样不明真相的宋庆龄却告诉他胡兰畦“从不属于我们的组织”^③。

历史留给我们的谜团太多了，身为史学工作者，我们的责任是寻找历史本真，正如杨奎松教授《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一文所述，我们应该跳出旧范式的“概念、模式、框架”的理论假设，从人性的视角来还原历史真相。

^① 陈翰笙著：《四个时代的我》，第 52 页。

^② 陈翰笙著：《四个时代的我》，第 53 页。

^③ 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东方出版中心 2013 年版，第 165 页。陈翰笙知道宋庆龄的身份，他晚年告诉照顾他起居的外甥女童瑜琼，宋庆龄是第三国际的党员。童瑜琼女士于 2013 年宋庆龄诞辰 120 周年之际，无偿捐出所有宋庆龄致陈翰笙函，并另捐 2 万元现金给上海宋庆龄基金会。